

中美关系中的 台湾问题

(1948 ~ 1982)

王伟男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中美关系中的

ZHONGMEIGUANXIZHONGDE

台湾问题

王伟男 著

(1948 ~ 198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王伟男著.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5
ISBN 978-7-209-04252-9

I. 中… II. 王… III. 中美关系-台湾问题-研究-1948~1982 IV. D822.371.2 D6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3079 号

责任编辑:高以芹 师青云
封面设计:张丽娜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1948~1982)

王伟男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网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中和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格 16开(170mm×240mm)

印张 13.5

字数 200千字 插页 2

版次 2007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5月第1次

印数 1-4 000

ISBN 978-7-209-04252-9

定价 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电话:(0531)88560107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其含义

- 一、中美冷战格局的形成 (002)
 - 1. 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 (002)
 - 2. 中美冷战格局的形成 (007)
- 二、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其含义 (011)
 - 1. 台湾问题的形成 (011)
 - 2. 台湾问题形成的含义 (024)
- 三、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026)
 - 1. 武力解决阶段 (027)
 - 2. 武力解决辅以和平谈判阶段 (028)
 - 3. “一揽子”原则阶段 (029)

第二章 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美调整国际战略的酝酿

- 一、五、六十年代全球战略格局的演变及其意义 (032)
 - 1. 美国霸权地位的相对下降 (033)
 - 2. 苏联力量的上升 (036)
 - 3. 两大阵营内部的纷争 (038)
 - 4. 第三世界的崛起 (041)
 - 5. 格局变化的意义 (042)

二、“尼克松主义”与美国新的全球战略构想	(044)
1.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及其内涵	(044)
2. 尼克松、基辛格对多极格局的谋划	(048)
三、中国国际战略调整的酝酿	(052)
1. 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	(053)
2. 对美战略调整的酝酿	(056)
3. 毛泽东—周恩来外交决策体制的形成及其意义	(060)

第三章 中美构建新战略关系过程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折冲(上)

一、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尼克松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主要考量与调整	(064)
1. 尼克松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主要考量	(064)
2. 尼克松政府在对华政策上的主要调整	(070)
二、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考量与调整	(075)
1. 尼克松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考量	(076)
2. 尼克松政府在对台政策上的主要调整	(081)
三、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中国对尼克松政府调整举措的反应	(086)
1. “5·20 声明”前中国对尼克松政府调整举措的反应	(086)
2. “5·20 声明”后中国对尼克松政府调整举措的反应	(090)

第四章 中美构建新战略关系过程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折冲(下)

一、基辛格秘密访华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讨论	(096)
1. 在台湾问题上的讨论	(096)
2. 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与意义	(106)
二、基辛格再次访华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108)
1. 在台湾问题上的讨论	(108)

2. 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与意义	(115)
三、 尼克松访华时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斗争与折冲	(116)
1. 在台湾问题上的讨论	(118)
2. 此次访问的主要成果与意义	(126)

第五章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美国对台政策的再定型

一、 从《上海公报》到《建交公报》	(129)
1. 《上海公报》的涉台内容及其含义	(129)
2. 曲折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之路	(132)
3. 《建交公报》的涉台内容及其含义	(139)
二、 从《与台湾关系法》到《八一七公报》	(142)
1. 《与台湾关系法》出台前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考量与运作	(142)
2. 《与台湾关系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含义	(146)
3. 中美在美台军售问题上的斗争与折冲	(147)
4. 《八一七公报》的主要内容及其含义	(151)

第六章 结论:影响美国对台决策的若干基本因素

一、 战略与安全方面的需要	(157)
二、 维护美国的“声望”与“道义”形象	(160)
三、 经济与文化利益	(165)

结束语	(169)
附录一 本书所涉历史阶段台湾问题大事记	(175)
附录二 本书涉及的若干重要历史文献	(181)
附录三 主要参考资料	(206)
谢 辞	(210)



第一章

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其含义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中,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与三大历史因素有关。首先是与当时美苏争霸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两大集团进行冷战的国际大格局有关,这是造成台湾问题的最根本的国际背景;其次是与中国政治的发展与演变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这是台湾问题得以形成的国内根源;第三是当时的国际政治与中国国内斗争这两大因素之间的复杂联系与纠合,主要是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在双方冷战对峙的背景下,对中国国内斗争进行的深层次介入与干涉,这是台湾问题得以形成的最主要的历史原因。以上三大因素导致台湾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双面性”特征:一个是国内层面,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另一个是国际层面,也就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其实质是美国出于其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的需要而对中国内政进行长期干涉,以及中国为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美国进行斗争的问题。^① 本书将主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际层面,也就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美苏冷战也是中美冷战格局产生的大背景,二者之间的逻辑关系

^①关于台湾问题的“双面性”特征,毛泽东在1959年10月同巴西等17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时曾有明确的阐述,谈话原文可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页。

将在下文中阐明。若从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来看,中美之间冷战格局的产生,明显滞后于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而台湾问题的源起,又与中美之间冷战态势的产生与发展有关。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美冷战的序幕。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发表干涉中国内政的“6·27声明”,并立即付诸行动。它为了有效地遏制新中国,对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残余政权实施了军事保护、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等政策,严重侵犯了新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从而导致中美冷战格局加速形成。台湾问题与中美之间的冷战对峙局面,在整个50年代呈现出相互交织、相互强化的趋势。

一、中美冷战格局的形成

毫无疑问,美苏冷战的重点在欧洲,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的较量仅限于欧洲地区。作为亚洲大陆上最大的国家,40年代后期的中国正发生着决定其自身命运的国共之间的激烈斗争。中国内部两股势力、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斗争很难脱离当时的国际大背景。因此,中美之间冷战格局的产生,无论是从历史的还是从逻辑的角度来看,都无法脱离美苏两大国在欧洲的冷战对峙和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争夺。所以,在讨论中美冷战格局的形成之前,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美苏之间冷战格局的产生与形成过程。

1. 美苏冷战格局的形成

就美苏之间冷战格局的形成而言,从表面来看,它是一系列历史事件的逻辑结果,但若从最根本的层次进行分析,则是当时美苏两国在国际战略目标方面的冲突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规律使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艰难岁月里,美国与苏联为了战胜共同的敌人,建立了卓有成效的联盟,进行了生死与共的斗争。然而,随着共同威胁的逐渐减弱,两国进行政治、军事结盟的原有基础开始遭到销蚀与弱化,原

来由共同威胁掩盖着的意识形态差异和社会制度之争再次浮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在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与背景下,美苏两国不同的价值观念与对未来国际秩序的不同主张、特别是这些主张背后各自所隐含的国际战略目标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这是冷战格局首先在欧洲形成的深刻根源。

二战期间,美国的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加上其在战争期间由经济、科技等其他实力转化而来的军事实力,美国终于成为真正的全球性超级大国。随着战争的结束,军事定货的减少,美国国内市场更加无法满足在战时膨胀起来的生产能力的需要。继续保持强大的国家实力,建立世界霸权,实现对世界市场的占有与控制,就被当时的美国决策者认定为美国资本主义经济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事实上,美国统治集团早在参战前就已考虑了战后的世界安排问题。1939年12月罗斯福下令成立“和平与改造问题委员会”,负责研究战后美国“为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秩序”需要什么“基本原理”。1941年初美国《幸福》《生活》和《时代》杂志的主编亨利·卢斯发表《美国世纪》一文,对此做出了回答。他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这是美国作为世界统治力量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于是,“世界主义”的外交理论取代了“孤立主义”。1941年12月美国国务院又设立了一个由国务卿赫尔任主席的“战后对外政策咨询委员会”,负责拟订解决战后问题的各种方案。1943年4月,罗斯福授意福雷斯特·戴维斯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罗斯福的世界蓝图》一文,透露了罗斯福对战后世界安排的设想。他的“蓝图”是从世界主义出发的。他要求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的、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具体措施有二:一是组建一个美国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普遍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二是建立以美国为核心的世界经济体系。罗斯福相信,由于战争中英、苏、中等国都仰仗美国的经济、军事援助,凭着美国的实力,他可以利用战时的“大国合作”来实现其“蓝图”。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逝世,副总统杜鲁门继任总统,他继续实现罗斯福的“世界蓝图”。同年12月29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郑

重宣布:“胜利已使美国人民有经常而迫切的必要来领导世界了。”^①然而,杜鲁门与罗斯福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罗斯福主张美国应通过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个大国之间的合作实现美国的领导,而杜鲁门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偏执,更主要地是出于对苏联日益强大、可能挑战到美国一家独霸地位的担心,开始对苏联实行对抗性的方针。

杜鲁门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在战后的世界上,能与美国相抗衡的只有苏联,它被西方政治家称为战后的另一“超级大国”。一方面,苏联在战时受到严重创伤,据统计,它的直接经济损失达4850亿美元,人口死亡2000万,占战前人口的10%以上;^②但在另一方面,这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威望,这成为它在战后同西方国家讨价还价的一项无形资产。而且,苏联是战胜希特勒德国的主要力量,德军在苏德战场上损失了1000万人,占它在二战期间伤亡总人数的73%。与此同时,苏联在反侵略战争中锻炼出了一支数量多、战斗力强、技术装备精良的军队,在许多指标方面仅次于美国,远远超过美国以外的其他大国。另外,从战争即将爆发前开始,苏联就一直致力于建立“东方战线”,西部邻国的一些地区先后划入苏联版图,苏联的领土扩大了60万平方公里,这在战略上无疑加强了苏联的地位。^③

对于战后世界的安排,苏联希望在长时期内保持国际和平,以便医治战争给苏联带来的严重创伤,恢复并振兴经济。为此,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由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代表组成的“新的特别全权国际组织”。斯大林还希望战时划归苏联的领土能得到国际承认,在东欧建立“安全圈”,使西部邻国“实行对苏联友好的政策,而不是实行反对苏联的‘防疫线’政策”。此外,他还希望推进“世界革命”,使更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在卫国战争年代,苏联在强调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同时,并没有把二者与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严格区别开来,无论是在对待邻国的领土问题上还是在处理其他外交问题上,

① 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

②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③ 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16页。

都有背离马列主义原则的地方。例如,1945年9月2日斯大林对日本投降而发表的《告人民书》中,就将1904年的日俄战争说成是日本对俄国的侵略,说“那次失败是我国的一个污点”,俄国等待着“污点会被清洗”。这种说法与列宁当年揭露日俄战争双方都是“为了争夺满洲和朝鲜而进行的一场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结论是相违背的。这反映了在苏联领导人的指导思想中,仍然存在着老沙皇大俄罗斯主义的思想残余,这对苏联处理战后国际事务不可避免地有着消极影响。^①

显然,苏联试图建立起一个有着鲜明独占性和排他性、同时还具有某种程度扩张性的势力范围,它们不仅是“军事上的缓冲地带”,也不仅是对付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思想和心理挑战的外部防线”,而且是苏联实行经济和政治控制的场所,^②更有可能是苏联推进“世界革命”的前沿基地。这不可避免地美国的战略目标迎头相撞:美国不能容忍在自己一家独大的这个地球上,还有大片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巨大的市场与自己正在扩张的经济“绝缘”而存在;它尤其不能容忍这个口口声声要“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红色政权继续壮大自己的势力;它必须“遏制”住苏联的这一战略企图。这是战后美苏在欧洲的冷战格局形成的最根本原因。

从史实来看,在战后初期,美苏双方曾保持过短暂的相互克制,两国都希望维持战时确定的雅尔塔体系。在苏联方面,除固守东欧外,它在其他地区也发动过试探性的进攻,但往往是受制辄止,如“伊朗危机”^③和“土耳其危机”。^④ 美国对东欧国家也只使用外部宣传、少量经

①彭树智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下卷)》,第16页。

②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页。

③1946年1月,伊朗就苏联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成立“自治”政府一事,向联合国控诉苏联干涉伊朗内政。美国政府亦随即就苏军驻扎伊朗问题向苏联提出照会,要求其撤军。杜鲁门也公开威胁将就伊朗问题采取行动。在此情况下,苏联不得不在当年6月从伊朗全部撤军。此后,美国势力大举进入伊朗,伊朗政府日益亲美。

④1946年7月、8月和9月,苏联三次照会土耳其政府,要求与土方“共管”黑海海峡,这遭到美、英两国的强烈反对,土耳其也在美、英两国的支持下拒绝了苏联的要求,此后,美国加强了对土耳其的援助,并最终将它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济援助等非军事手段鼓动其内部演变。^① 当这些措施遭到挫败后,美国除了做出象征性的表态外也无计可施。因此,美国的战略重点在西欧,苏联则看重东欧,双方都执行欧洲第一的方针,紧张而审慎地对峙着。然而,苏联的这些试探性进攻,美国对东欧国家的觊觎,在当时特殊的国际背景下,都成了双方相互失“信”、逐步采取越来越具有进攻性的行动的导火索和催化剂。于是,在一系列看似“偶然”的事件推动下,美苏冷战从揭幕到展开,渐次升级,最终以1949年4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和1950年4月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与计划》的NSC68号文件出台为标志,达到第一次高潮,美苏在欧洲的冷战格局至此正式形成。

二战后在欧洲形成的这种以两大集团冷战对峙为特征的新型国际秩序,与该地区历史上重大国际战争(如拿破仑战争、德国统一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等)结束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相比,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作为19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逻辑结果,在传统的权力与地缘政治斗争中,新增加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这种分歧使新的国际政治斗争披上了一层道德取舍与价值判断的外衣,其影响与含义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形势比人强,当时数量并不算多、形式上已经独立的主权国家,为了证明自己在“道德”上的正义或正确,大多数不得不在对立的两大意识形态、从而也是两大政治集团之间做出或果断或优柔的抉择。而中国作为远东地区最大、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一个资源丰富、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随着在其内部代表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国共两党间斗争结果的日趋明朗,它不能不成为美苏两大国和东西方两大集团争夺的重要目标。美苏之间的冷战对峙通过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而渗透到中国,成为日后新中国与美国之间冷战格局产生的肇因。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两国出于对各自国家利益的认知和考量,对这场战争做出了完全对立的反应,是中美冷战格局加速形成的直接原因,并由此产生了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① 何春超主编:《国际关系史(1945~1980)》,第74页。

2. 中美冷战格局的形成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局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同美苏关系的演变轨迹相类似,抗日战争期间国共双方合作关系的基础在日本投降后很快烟消云散,并以比美苏关系的恶化速度快得多的节奏走向兵戎相见。美国在中国内战爆发后先是进行貌似“中立”的调停,先后派出赫尔利、马歇尔等作为“调停人”,调停失败后就全面支持国民党对共产党展开的大规模内战,这就为日后新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了调。而苏联在日本投降后的一段时间内,在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东北几个省份的接收问题上采取的态度与行为,也使得在对日战争结束前夕苏联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之间结成的脆弱“同盟”关系^①很快走向土崩瓦解。随着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节节胜利,特别是在毛泽东于1949年6月下旬和8月中旬分别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别了,司徒雷登》的著名文章后,未来新中国与美苏两大国的基本关系模式也就初显端倪:对苏联及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一边倒”的战略选择;对美国 and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以及其他所有的非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主要执行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

所谓“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就是新中国在国内要建立起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相同或相似的“人民民主专政”,在国际上要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共同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颠覆。“……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

^①指1945年8月14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与国民党政府外长王世杰在莫斯科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相关附加文件。通过这些条约和文件,苏联承诺对日作战,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它在中国东北也获得了由“雅尔塔协定”规定的特权。这个条约还是中国的外蒙古(现在的蒙古国)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从中国独立出去的国际法依据。

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①

所谓“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就是要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另起炉灶”还被引申为如下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在此基础上,新中国同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②

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就是新中国在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交之前,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毛泽东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打扫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③

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美冷战的态势已经显现,但由于各种

①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68页。

②见钱其琛于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贡献》。

③见钱其琛于1993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毛泽东在开创新中国外交和国际战略思想上的贡献》。

原因,并没有发展到像美苏两大国在欧洲已经形成的那样激烈的对峙程度。就当时的美国来说,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两种不同的趋势还在发展着,主张对华遏制与主张对华接触的两股势力还在激烈地较量着,美国决策层中还有人在期待着中国新政权能够“改弦更张”,期待着毛泽东成为敢于对抗苏联家长式作风的“第二个铁托”,^①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政权的政治和军事支持也日益呈现出“三心二意”的态势,它的对华决策还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因而它对新中国执行的遏制政策明显比对苏联的遏制政策要“宽松”一些。^②就新中国方面而言,由于它在大陆上还有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要做(如清除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以合适的方式解放西藏,在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等),蒋介石集团盘踞的台湾还没有解放,因此,此时的中国政府并不愿意与美国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打破了中美关系这种不明朗的状态。1949年10月1日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已经令美国统治集团沮丧不已;而195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对苏联进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访问,并于1950年2月14日由周恩来同苏方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更令那些期待中苏关系很快破裂的美国决策者失望之极。美国国内、特别是军事部门的领导人要求对新中国采取更加强硬政策的声音更加高涨。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于美国多数决策者认定,这场战争的进攻方是位于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并且这种进攻是在苏中集团的“支持和怂恿”下发生的,^③从而使美国决策层内主张

①铁托(Josip Broz Tito, 1892~1980),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缔造者。二战结束后初期,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曾经同苏联保持着一种非常密切的同盟关系,共同对抗西方阵营的颠覆和渗透。但主要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于1948年下半年被苏联作为“异教徒”逐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铁托本人被苏联说成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杀人犯和间谍”。从此,南斯拉夫走上了一条中立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独立发展道路,人称“铁托道路”。

②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前杜鲁门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具体争论,可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第一、二两章。

③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130页。

对华强硬的势力在争论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受其影响,杜鲁门政府立即开始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对新中国实施强硬的遏制战略。面对国家安全受到的空前挑战,新中国领导人最终做出了出兵朝鲜的战略决策,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两国之间的“低度”冷战迅速发展为激烈的“热战”。

朝鲜战争的结果,尤其是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使中国在近代史上第一次作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登上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它在主观上彻底打破了存在于美国决策者头脑中的“中国既不愿、也不敢与美国对抗”的幻念。^① 林利民认为,“无论从亚洲抑或是世界力量均衡的观点看问题,美国决策人都不能容忍新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进一步崛起,成为亚洲的苏联”,^②正如他们不能容忍苏联在欧洲继续扩展自己的势力一样。因此,在朝鲜战争期间及其结束后,美国急速地加强对新中国的遏制。在政治上,它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反而支持只统治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为中国的“合法政权”。它极力阻止新中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席位,反而支持台湾当局在联合国“代表”全中国行使国际权利。它还通过各种途径迫使它的西方盟国与它一道在政治承认和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孤立新中国。在经济上,美国通过联合国、“巴黎统筹委员会”等国际机构,对新中国实施比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更加严厉的封锁。在其盟友不愿因为封锁中国而损害自身利益的情

^①林利民认为,美国决策人历来对中国怀有两大“幻念”。第一是美国有“恩”于中国。他们认为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历史上曾使中国免遭西方其他列强的瓜分,抗日战争时美国又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物力和人力支援,所以中国不应该与美国为敌。美国决策人在中国问题上的第二个“幻念”是,中国一向积贫积弱,主观上没有胆量、客观上也没有力量与美国为敌。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时期里,美国的第二个幻念有其超强国力和独霸地位为后盾。罗斯福政府在雅尔塔会议上对中国利益的私相授受、任意践踏,杜鲁门政府在“调停”中国内战时的颐指气使、翻云覆雨,在对待中国向美国提出的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的严正警告时表现出的轻蔑与傲慢,都体现了这两个“幻念”在美国决策人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关这两个“幻念”的详细论述,可参见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428~429页。

^②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431页。

况下,美国仍然一意孤行,把从朝鲜战争起逐步确立的对华封锁政策一直持续到 60 年代末。在军事上,美国通过与台湾当局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签订双边和多边条约,通过在中国周边的国家或地区驻扎军队,通过在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地区对新中国进行直接的军事挑衅,对新中国实施战略与安全上的威慑。由此,中美之间乃至整个远东地区的冷战格局也逐渐形成。

二、 台湾问题的形成及其含义

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新中国的态度相联系,它对蒋介石集团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早在 1948 年底,美国决策层就开始意识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是迟早的事,遂日益执行一项与蒋介石集团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的“脱身”政策:逐步减少对它的经济与军事援助,把这种援助维持在只具有象征意义的水平上,以应付国内亲蒋的反对派的强烈指责;通过指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不随国民党残余政权南迁广州的举动,刻意冷落同该政权的关系;最后是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历数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从而企图撇清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败绩的干系,也为该政权“钉上最后一枚棺材钉”。^①

1. 台湾问题的形成

也是从 1948 年底,就在美国决策层开始与蒋介石集团这艘“沉船”拉开距离的同时,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也开始进入美国战略决策者的视野。1948 年 11 月 24 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当时的代理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的要求,对台湾岛及其毗连岛屿对“美国安全的战略意义”进行了有文件可考的第一次评估,评估的结果形成了一份主

^① 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 37 页。